

# 第 一 篇

## 世界格局中的中、美、日关系



# 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

张蕴岭\*

冷战结束不仅改变了世界大格局，同时也改变了中、美、日关系的利益基础和结构性质。正像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处在一个过渡转变过程一样，中、美、日关系也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变过程。由于中、美、日关系是属于对世界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大国关系，认识和研究它们的变化不仅对三国本身，而且对它们所处的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 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二战后开始的冷战时期，中、美、日关系发生过重大的转折和调整。60年代以前，不存在中、美、日之间的直接三边关系。由于中国与苏联结盟，属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因此中美之间是敌对的。由于日本与美国结盟，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中日之间亦是对立的。60年代以后，中国与苏联分歧日深，不仅导致分裂，而且发展成敌对关系。中苏对立促进了中美、中日的建交，并进一步把中国与美日拉到一条战线上。当然，中国不属于西方集团，但在中国的战略中，借助美国方可抵御“北方熊”的威胁。在美国的战略中，日本属于盟国，中国只是其与苏联集团对抗的“盟友”，被作为与苏对抗的战略前沿。至于中日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日本所所长，研究员。

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从属于美苏对抗大格局。这样，中、美、日之间就没有构成一种具有战略影响的三边关系结构。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尽管美苏是两个超级大国，各自代表着两个集团，中国只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弱极”，但是中国立场的选择和行为变化具有很大的“战略影响”。由于中国的这种战略重要性，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且这种关系的任何变动的影响都远超出三者利益的本身。

冷战的结束以苏联的解体和以其为首的“东方集团”的垮台为结果。美苏对抗结束，中苏对抗停止（早于苏联解体），极大地改变了中、美、日之间的关系性质和结构。首先是美俄不再对抗，中俄成为了战略伙伴，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需要借助对方反对第三者。因此，中美之间在这方面的战略利益和关系不复存在了。中、美、苏（俄）之间的旧三角关系基本消失。<sup>〔1〕</sup>因而，中、美、日之间的关系必然发生新的调整和重组。

### （一）中美关系

冷战后中美之间关系的特征和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与苏联对抗的这个共同大战略利益消失，加之中国继续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美之间已经没有政治战略联合的基础。这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主要建立在国家双边机制基础之上。同时，尽管冷战结束，但意识形态的因素还在起作用，因此，中美之间的对立性突出了。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对立性又与过去不同。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由于中国推行市场经济改革，与美国在经济体制和联系上的一致性增强，从而增加了两国间的“共存性”。美国开始从新的角度考虑和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希望通过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和平的方式把中国拉入西方体系，希望在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上得到中国的支持和配合。因此，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种“既非盟友，又非敌人”的关系。但是，中国的发展导致新的不平衡。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政治上不断

上升的大国，是一个挑战者。作为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作为一个正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更有发言权和影响增大的强国，在许多方面都形成对现行秩序的挑战。特别是对美国这样一个自持是现行秩序维护者的超级大国来说，这种挑战几乎是不可接受的。

从美国方面来说，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支持中国沿着现在的改革和开放路线继续发展，把中国纳入以西方体系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另一方面，又要接受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一个强大的中国的挑战。<sup>(2)</sup>美国在关于对中国是实行“交往”（engagement）还是“遏制”（containment）政策上所出现的摇摆正是反映了这种矛盾。<sup>(3)</sup>

从中国方面来说，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也相当困难。一方面要承认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拥有巨大影响这个现实，与美国建立稳定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无法接受美国惟我独尊、发号施令，对中国施压或进行遏制的行为。中美关系时好时坏的反反复折，正是这种矛盾的体现。

从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态势来分析，美国仍然是一个超级大国，力图建立符合其利益的世界秩序，但控制力下降，无法号令天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发展很快，实力增强，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上升强国。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显然是一种发展着的动态失衡结构，出现矛盾和冲突是必然的和经常的。如何处理这些不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取得稳定和一定的平衡是难度很大的。特别令人关注的是这种结构会不会发展成对抗性的关系。如果中美发生对抗那将不仅会对两国，而且也会对地区及至整个世界产生严重影响。

中美会不会发生像冷战时期美苏的那种对抗呢？如果处理好，应该说是可以避免的。与美苏对抗所不同的是，在新的环境下，中美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利益基础。首先是经济利益。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也需要美国的投资和技术。比如，美国为中国提

供了 1/6 的进出口市场(如果加上香港转口,市场更大),中国的许多出口产品(如纺织品、成衣等)都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美国在中国市场上已经拥有巨大利益,要进一步打入和占领中国这个被认为是世界最有增长潜力的大市场。这种双向的利益机制在两国内部各自生成巨大的利益集团,它们成为阻止两国关系恶化,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从而使得政府在处理矛盾和冲突时不得不谨慎从事,考虑经济后果。再则是战略利益。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发展环境,首先要搞好与美国的关系,要力图与美国“减少麻烦,避免对抗”。美国要在地区和国际范围做事,发挥其影响,需要中国的支持与配合。事实已经证明,许多重大事务,没有中国同意和支持,就难办好,甚至办不成。显然,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尽管是不对等的),这就构成了两国寻求协调和合作的基础。中美不能发生对抗,这是处理两国关系的一个战略前提,没有这个前提,麻烦就大了。

## (二) 中日关系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给中日关系打下深深的烙印。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崛起,曾令中国担忧,因此,防范日本的再军国主义化是中国对日关系的一个主要战略考虑。战后,日本与美国结盟,加入西方阵营,中日关系从属于中美关系,因此,只是在中美建交后中日关系才正常化。中日建交以后,由于有对付苏联威胁的共同战略利益,两国关系间的历史积怨缓解。通过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开始从两国的长远利益出发发展全面关系。

冷战结束以后,苏联威胁消失,原来的战略合作基础不复存在,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开始从新的角度处理与对方的关系。从日本方面来说,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使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不愿再做“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要做政治大国。特别是二战后 50 年,被认为是日本彻底结束战败国历史的转折点。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就要首先在亚洲、在亚太地

区发挥主要作用和影响 并且把这种作用延伸到世界。事实上 日本利用其巨大的经济实力，通过提高向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认捐额 增加向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以及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逐步扩大其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的政治影响力。日本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发挥一个政治大国的作用。同时，尽管日本坚持“和平宪法”又有美日军事同盟条约的牵制 但日本也在向加强实际军力的方向发展。日本在武器装备的质量方面已拥有很大优势，是世界第二大军费开支国。然而，在亚洲近邻，日本必须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出于长期的战略利益，日本应该与一个强大的中国修好，避免对抗为敌。同时，一个近在咫尺的巨大市场也是对日本极富吸引力的，密切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对其未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一个强大的中国毕竟是日本的一块心病。中国不仅被视为是对日本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的一个重大障碍，而且也是其一个潜在的主要威胁。<sup>(4)</sup> 由于历史的怨结 日本人所最为担心的可能是一个强大的中国将来会对其算账。这种担心促使日本在加强本身力量的同时，竭力建立一个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组成的防范中国的安全网。这必然在中日之间制造矛盾。

从中国方面来说，最重要的是创建一个长期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与邻国建立起友好与稳定的关系，以便能够顺利地进行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其中，与日本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居十分重要的地位。比如，中国从发展长期友好关系出发，在建交时放弃战争赔款要求，主动提出对钓鱼岛的主权争端采取搁置争议，联合开发资源的建议，并就此与日本达成谅解。但是 中国面对的是一个要做“正常国家”而又不愿承认和清算侵略历史的日本，一个经济上强大、政治作用不断扩大的日本。这些都是令中国颇为担心的。特别是美日新军事同盟条约，把日本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扩大，把防范中国作为主要目标，更是令中国难以吞咽的一颗苦果。在国际和地区关系和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看来日本更注重稳定和缓和，有时明

显不同于美国，这是由地缘经济和政治因素决定的，对此，中国可以加以利用，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甚至制裁。但是，在这方面，往往是很有限度的。

中日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冲突点。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如果日本不能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 视中国为真正的威胁 从防范中国出发制定自己长期的对外政策，而不是“减少麻烦，避免冲突，发展友好”，那么对抗性因素就会增加。这是最危险的。当然，中国不仅要接受一个强大的经济日本，也要能接受一个强大的政治日本。日本要做政治大国，这是迟早的事。历史上，中日两国的关系从来是建立在一强一弱的结构上，没有过两强共处的格局。因此，中日两国如何处理好新格局下的关系，这的确是一个新课题。

### （三）美日关系

冷战后，美日关系变化的最主要特征是经过反复调整确立新的联盟，力图在建立和维持亚太地区新秩序方面起主导作用。

从美国方面来说，对日关系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经济、安全和全球合作。经济关系是美日关系中最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之间有着非常强的相互依赖性。在很长时间里，日本靠向美国增加出口积累外汇，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但自 70 年代以来 由于美国的市场压力增大 美国对日本采取了“双重战略”即一方面限制其向美国的出口增长，另一方面迫使其开放封闭和保护的国内市场。为此，双方不断出现矛盾和争斗。由于利益攸关，在许多方面，日本表现出强硬，甚至抵制。不过，尽管美日经济矛盾常被大肆渲染，应该说，在迫使日本开放市场方面，美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应该看到，由于美国市场的扩容量降低，日本的市场内需增强，美国在市场压力方面的力量可能会变弱。特别是在日本克服目前的经济困境之后，其在对美国的经济关系中可能会有更多的主动权。这会进一步调整和改变美日经济关系的

结构和走势。

在安全方面，美国在亚太地区所做的最明显调整是放弃冷战刚结束时预想的“收缩”战略，重新强调其军事存在，构造新的安全机制和体系。日本是美国构造亚太新安全体系的关键。美日在新的亚太安全体系中找到了新的平衡点。这方面可以从更新的美日安全条约中得到证明。从美国方面来说，需要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扩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一，积极支持美国在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活动；其二，通过新的同盟条约使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上与美国一起行动；其三，发挥日本在多边安全机制中的骨干作用。美国不再希望日本仅仅做一个“卒子”最好在需要的时候能当一名“将军”。这种调整是与日本要做政治大国进而做军事大国的意图和政策是一致的。事实上，日本也在积极利用美国的这种战略，“见缝插针”和“得寸进尺”地扩大自己的“合法”力量和作用。问题在于：第一，美国靠日本作为主要伙伴在亚洲建立和维持安全秩序行不行？第二，日本的作用会扩大到什么地步？美国会“宽容”到什么程度？能否为其他国家所接受？第三，美日联盟的军事安全目标对准谁？比如，如果把中国作为重要危险和威胁，那势必会导致中日之间关系的恶化。中国会接受么？日本能够承受么？这些都是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由美日联盟主导亚太安全是行不通的。

在国际方面，日本要做世界和地区政治大国。要实现这个目标，还要借助美国。冷战结束后，一个时期，日本的舆论十分强调要做一个独立的政治大国。但是，体察国际和地区环境，日本很快认识到，这不现实。因而，日本似乎抛弃了“理想主义”，转向实用主义，强调建立新的日美同盟关系。日本在海湾战争中起到“财政后援”的作用，为战争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得到了美国的称赞。这为日本进一步扩大参与范围提供了基础。特别是日本通过参与维持和平行动而确立了其有限直接军事参与国际事

务的合法性。从美国方面来说，希望把日本直接拖入国际干预行动 特别是由日本承担更大的资金提供责任。从日本方面来说 决不会满足于被限制在“后援”地位，要走向前台。日本已经在国际组织中成为资金“老大”美国已经力不从心。但是 美国决不会让日本超过自己，更不能取代自己。美国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希望在美国力量和主导地位下降的情况下，日本成为其有力的帮手。如果日本借此闹独立性，美国是不会接受的。

美日关系有着很大的战略一致性。美日同盟关系仍然是两国关系的核心。日本还难以对美国的霸权挑战，主要还只是借美国的力量和美国希望扩大日本作用的意图增强自己的作用和影响，以便从“受困”的笼子里钻出来。而美国不愿接受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日本 不愿日本成为一个“从宝瓶里放出来的魔鬼”只是想其成为自己的世界和地区支配战略上的强有力帮手。这可能是美日关系发展转变中的一个主要特征和矛盾点。

## 二 中、美、日三角关系

中、美、日之间有没有三角关系？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这里，首先有必要对三角关系的定义和含义加以界定。确定三者之间是否存在三角关系，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三者所构成的双边关系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具体于中、美、日之间的关系来说，在中美、中日之间，美中、美日之间和日中、日美之间的六对关系之间存在相互联系，从而使它们构成一个关系结构整体。二是三者双边关系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中美关系之间的变化会对美日或中日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中日关系之间的变化会对日美或日中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等等。再则，三者关系的外延作用，即它们在地区甚至是国际范围内具有一定或者重要影响。无论从哪个范围来说，中、美、日之间的关系都至少对亚

太地区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导致中、美、日三角关系形成的根本因素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力量增强。由于中国力量的增强，使中、美、日之间产生了超出单向双边关系的联系，出现一方变动牵动其他几方关系变动和在更大范围产生重要影响或变化的机制。

### （一）三角关系的构成机制

在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构成中，存在着利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三者之间进行协调和合作以及保持关系稳定的基础。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确立三者之间的一致性：第一是保持良好双边关系上的利益。中美、中日和美日之间互有需求，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需要加强合作，减少冲突，保持稳定。在中、美、日三者之间的关系中，重要的是，任何的双边关系的发展都难以以牺牲第三方的利益为基础，否则，就会破坏三者之间的联系机制，使三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对立或不稳定。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双边关系的发展需要考虑到第三方的利益和态度。这种相互联系和牵制构成中、美、日关系的一种内在的“稳定器”。第二是在地区事务中进行协调和合作。这可以体现在：一方面，地区事务没有三方中的一方支持都是难以成行的。比如，在创造一个稳定的地区环境方面，三者有着共同的利益。当然，各自所主张的实现方式是不同的。既然不同，为什么还会合作呢？原因在于任何一方都不能无视其他方而建立起秩序，需要共同参与和协调与合作。这是一种由于力量对比所产生的制约牵制机制。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一体化加强，政治利益交融，涉及各方利益的领域增多，这需要作出共同努力。比如，在地区市场开放方面，由亚太经合组织推动的进程需要共同合作，在诸如能源、环境以及资源管理等方面，中、美、日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这样说，没有中、美、日之间的合作，任何地区重大事务都是办不成的。中、美、日关系在地区事务中的这种分量是“非同寻

常”的。<sup>[5]</sup>这是一种由于“利益共存”所产生的黏结机制。

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构造并不只是由共同性决定的，其中矛盾性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共同性构成连接机制，矛盾性构成牵制机制，二者共同组成三角关系的框架和结构。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矛盾性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目标差别。美国要在亚太地区及世界谋求主导和霸权，要建立以其为核心和由其控制的秩序。美国凭其力量可以自作主张，采取行动。美国需要一个由其制导和左右的地区和世界新秩序。日本要借助美国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和影响，要挣脱战败给其加上的束缚，做世界大国。日本需要美国的力量，但要设法摆脱其控制。日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自主发挥其作用和影响的新秩序。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长期和平和稳定的地区和国际环境，为此，需要与大国、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发展友好的关系。但是，中国不接受美国的霸权，反对美日结盟对付自己，会越来越不接受强加给它的约束和不利环境。中国需要一个不由美国控制的，可以更多公平参与和发挥其作用的新秩序。其二，结构差别。美国是当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主要战略是在经济和政治上维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影响。但是，其实力和控制力相对降低，往往力不从心。日本是一个已经成长起来的经济大国，仅居美国之后。日本要用其经济力量扩大其政治作用和影响。但另一方面，日本的经济进入后成熟期，正经历艰苦的调整，其抗争力不如上升时期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经济规模和势力不断增强。中国一方面要求加入现行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同时，另一方面，又要求改变对其不利或有限制的不合理秩序，力图建立新秩序。当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有限，现行国际体制对中国的这种要求的对抗力量和制约力量很强。尽管如此，这种上升的强国（中国）和下降的超级大国（美国）以及争当超级强国（日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平衡的关系。其三，利益差别。在经济利益上，美国是最大的市场，但是受到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美国的主要战略是

通过单边的、双边的和多边的手段打开日本和中国的市场。特别是美国的单边强制性行动(如 301 条款)无论对于日本还是中国,都是难以接受的。日本长期实行外向扩张、内部保护的经济发展战略。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日本不得不进行调整,开放市场。但是,日本需要选择和时间。另一方面,日本将可能受到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中国需要扩大出口市场,但同时又需要对国内市场进行有效保护。中国既依赖美国市场,又依赖日本市场。中国受到美国和日本的压力(日本的压力会增强),然而中国需要时间和空间进行调整和发展。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三者利益的差别更为明显,特别是在中国和美日之间,对于关系、秩序和体系的要求和努力有着巨大的差别。美国要力图遏制中国的崛起和挑战,日本要利用各种机制防止中国可能带来的威胁;中国要打破对自己的限制和约束,增强自己的分量和影响。问题在于这样一种差别结构如何保持平衡。如果结构过度失衡,则会导致矛盾激化。这是最危险的。

## (二) 三角关系中的互动联系

中、美、日三角关系之间的变化和调整存在着越来越强的互动性。这种互动性一方面体现了三者之间不断增强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体现着三者力量和利益之间加强的制约。我们可以从以下几对关系的变动联系中进一步分析他们间的互动性。

在中美—中日—美日关系中,中美关系的发展直接影响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好,中日关系中的麻烦就少,就好相处。特别是中国,可以通过中美关系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反之,如果中美关系不好,中国就要通过发展中日关系来减轻中美关系的压力。日本也会考虑这个因素,但可能面临困难的选择。日本可能会借助美国对中国强硬,从而使日中关系也不好,但这要冒与中国关系恶化的风险。中国是日本的近邻,经济关系日益重要,日本不能不慎重选择。日本也可以借此对中国亲近,借机向美国显示自己

的分量，增加对美国关系中的筹码，但这无疑会受到美国的压力。

在美日—中美—中日关系中，美日关系好，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特别是如果美日联合对付中国，那么，中美和中日关系就会陷入麻烦，但另一方面，美日关系有麻烦，也会对中美有影响。中国和美国都可能会通过发展双边关系来对日本施加压力。但是，实际上，美日关系不会因具体问题上的矛盾而破裂，中美联合对付日本的可能性也很小。

在中日—中美—日美关系中，中日关系的发展对美国是一个关注点。如果中日关系密切，美国就会警惕，可能要采取措施压日本松散与中国的关系。在这方面，中日关系受到中美关系的制约，美国不会让中日关系影响中美关系。当然，如果美国施加压力，日本会考虑，日本不会以日中关系损害或牺牲日美关系。

重要的是，中、美、日关系的这种互动影响远远超出三国关系范围，不仅对亚太地区，而且对世界范围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会引起一系列关系的连动。这就体现了中、美、日关系的重要性。

### （三）三角关系变动的选择模式

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变动后影响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三角力量不平衡，中国是较弱的一边，但又是继续增强的一边；二是内部不是一种三方对峙或两方对一方的对峙关系，对外不形成一致的集团；三是三角关系基本支撑点是亚太地区事务。这几个特点不仅规定了中、美、日关系的变化特点，而且也限定了其变化影响范围。当然，对于三方来说，任何变化和调整都涉及各自的利益，因此，各自在关系处理上的选择是利益攸关的。

#### 注 释

[1] 当然，由于中美关系矛盾加深，在中国的战略中，利用中俄关系的改善，来缓和美国对中国的压力，从而形成一种“新中、美、俄三角关系”。不过，这种新三角

关系与旧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性质有所不同，还不具备敌对性质。对这个问题这里只是提及，并不想做进一步的分析。

〔2〕由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完成的亚洲政策报告明确提出，“美国在亚洲地区所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就是如何面对中国成为强国这个事实”。见《再造平衡》，载《亚洲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1996年，第18页。

〔3〕比如，两个对美国政策很有影响的人物的说法就体现了这种矛盾。助理国务卿洛德认为，美国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不知道下个世纪中国是什么样子，有可能成为对手。前助理国防部长奈提出，如果与中国打交道的政策失败，那么，只能实行遏制。“Aresurgent China sets off alarms over containment” 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5年7月7日。

〔4〕登伊迪丝·特里：《中国抑制日本在亚洲的实力》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5年1月10日。

〔5〕中西辉政：《调整日、美、中三角关系是日本外交的重大课题》载《日》《呼声》，1993年11月号。

# 世界新格局中的中、美、日关系

卡门西塔·T. 阿奎拉\*

## 一 中国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以一个局外者和分析家的眼光来论述有关中国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作为对这一事实的承认，中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拥有一席。中国与其传统的贸易伙伴国日本维持着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在中日关系中惟一产生过不和谐的就是日本对其在二战中侵华历史的观念问题。除了在中国对其柬埔寨盟友的命运问题上，以及中国反对美国前政府向台湾出售武器和最近美国政府允许台湾“总统”李登辉访问其母校的问题上出现过一些小波折外，中国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一直被认为是健康发展的。尽管美国对中国政府在1989年的做法作出了反应，但在克林顿政府期间这些都已逐步得到了改善。

苏联曾被认为是中国安全的一个严重威胁，但冷战的结束及苏联解体而成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也许已改变了中国的担心。美国在这一地区中充当着势力均衡者的角色。即便从前苏联分离出来的中亚穆斯林共和国靠近中国的北部边界，中国并不认为其领土内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构成威胁，军方对应付这类事件充满信心。

\* 作者是菲律宾大学的教授。

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与中国和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这些中国的东南亚邻国，以及台湾都各自宣称拥有主权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即中国的南沙群岛）有关。然而对台湾的政治控制将仍然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如果中国适当地处理有关香港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及与在香港的投资者的关系，将意味着中国会更加繁荣。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问题并没有结束。中国已推荐了一位西藏（班禅）的继承人，而印度却向达赖喇嘛及另一位继承人提供保护，这一矛盾将继续成为印中两国关系之间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未升级成为一场公开的冲突。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中国并未使用其否决权来反对美国在海湾战争中针对伊拉克萨达姆的行动。

自197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地位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邓小平采取的经济改革使中国达到了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长。现代化计划给予中国人民以很大的自由来提高他们的教育能力和技术方面的技能。农业改革和家庭承包制从根本上促进了人民的福利。工业和市场改革及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加速了经济增长提高了12亿人民的生活质量。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使得分析家们相信，中国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也能成为如日本、美国和德国那样的经济大国。

以下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记录并在吉姆·罗沃尔（Jim Rohwer）所著《亚洲在崛起》一书中被引用的中国直至1994年的经济增长记录：

国民生产总值 PPP 或购买力平价），

1993 年 .....	\$ 20830 亿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993 年 .....	\$ 2330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1975—1984 年 .....	7.5%
1985—1994 年 .....	9.9%
国内总储蓄，1994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40.5%